

# 社会动员视角下老年人储蓄焦虑的成因与治理

华心慧 陆冠呈 赵艺萌 张宏宇

江苏理工学院, 江苏常州, 213001;

**摘要:** 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不确定性风险持续扩散的背景下, 老年人储蓄焦虑现象变得日益明显突出。储蓄行为原本应当体现风险预防和理性规划的特征, 但在现实实际情况中却呈现出过度防御、过度保守甚至情绪化的倾向, 进而会影响到消费结构、家庭代际关系以及社会资源的配置。以往已有的研究大多是从生命周期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或者养老保障制度的角度来进行解释, 然而对储蓄焦虑背后隐藏的社会结构因素和动员机制关注不够充分。本文从社会动员视角着手出发, 构建起“风险感知, 制度信号, 家庭责任, 社会信任”这样的四维分析框架, 全面系统地阐释老年人储蓄焦虑现象的生成逻辑。在此分析的基础之上, 提出以制度信号强化、社区嵌入重建、情绪治理机制完善以及多层次协同动员作为核心的治理路径。研究方面认为, 老年人储蓄焦虑并非单纯简单的个体心理方面的问题, 而是社会动员结构失衡所产生的表现, 其治理的关键之处在于重构社会支持网络并且提升公共信任水平。

**关键词:** 老年人; 储蓄焦虑; 社会动员; 风险感知; 治理路径

**DOI:** 10.69979/3029-2700.26.04.070

## 1 问题提出, 从理性储蓄转变为焦虑储蓄

在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以及社会风险结构持续重构的大背景之下, 老年群体的经济行为展现出新的结构性特征: 按照生命周期理论来说, 个体进入老年阶段之后通常会进入资产消耗时期, 其储蓄率理应随着收入下降而逐步降低<sup>[1]</sup>。但在现实社会情境当中, 老年人并没有像理论预期那样明显减少储蓄, 相反在部分地区和群体里呈现出储蓄倾向持续强化甚至过度积累的现象, 储蓄行为不仅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自然回落, 反而表现出明显的风险防御取向<sup>[2]</sup>。这一现象表明老年阶段的储蓄决策已经超出传统理性选择模型能够解释的范围。

进一步观察能够发现, 当前老年人储蓄行为具备鲜明的情绪嵌入特征: 一方面储蓄动机逐渐从收入平滑与生活保障转变为对未来风险的高度预防; 另一方面储蓄行为中夹杂着明显的焦虑情绪与不安全感。这种“焦虑型储蓄”并非单纯因为客观经济压力, 而是在风险感知不断放大、制度预期波动以及社会信任弱化的综合作用下形成, 其核心特征在于个体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进行过度放大, 并通过提高储蓄比例来寻求心理上的安全补偿。

现有研究大多立足于经济学视角阐释老年储蓄现象, 重点考察预防性储蓄动机、医疗开支的不确定性以及养老金替代率等要素, 这类研究在解释储蓄规模变动方面具有参考意义, 但常把储蓄当作个体理性决策的产物, 忽略了其社会嵌入性和结构制约性, 实际上老年人的储蓄选择并非独立存在, 而是在国家制度、社区支持网络、家庭结构和社会信任体系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换

句话说储蓄焦虑不仅是个人心理状态的体现, 更是社会动员机制与制度保障体系运行状况的投射。

## 2 理论框架: 社会动员视角下的解释路径

### 2.1 社会动员理论的适配性说明

社会动员理论最开始是用来阐释社会资源整合、集体行动形成以及制度与个体间互动逻辑的, 它的核心探究点在于特定结构条件下社会资源怎样转化为个体行为驱动力<sup>[3]</sup>。从广义的角度来说, 社会动员包含政治动员、集体行动, 还包括制度信号传导、社会信任培育以及支持网络融入等常规结构性活动。个体行为并不是独立的抉择, 而是受到社会结构持续塑造与调节的产物<sup>[4]</sup>。在老年人储蓄这个议题上, 传统经济理论过于侧重收入限制与风险预期变量, 却常常忽略行为的社会嵌入特性<sup>[5]</sup>。实际上, 老年人储蓄决策并非仅仅依靠理性收益测算, 而是在制度保障水平、家庭责任负担及社会信任度等多重结构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当社会动员机制高效的时候, 公共保障、社区帮扶和家庭协作能一起对冲个体风险; 反之, 要是动员能力薄弱或者结构失调, 风险就会内化至个人层面, 储蓄也就转化为替代性安全工具, 所以, 老年人储蓄焦虑可以看成是社会动员结构效能弱化的体现。

### 2.2 四维结构框架的构建

根据社会动员理论的核心要点, 本文搭建“风险感知, 制度信号, 家庭责任, 社会信任”这样的四维结构框架, 以此来解释老年人储蓄焦虑的形成机制。

第一,风险感知结构方面,风险并非只是对客观事实的简单体现,而是在社会传播和制度信息的作用下构建出来的认知结构<sup>[6]</sup>。在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医疗支出不断上升、护理成本存在不确定性,还有寿命的延长,让风险成为高度可被感知的变量<sup>[7]</sup>。当风险信息持续得到强化却缺少稳定保障的回应时,个体的风险感知就会被放大,并转变成焦虑情绪。

第二,制度信号强度上,制度信号是指公共政策与社会保障体系向个体传递出的稳定预期<sup>[8]</sup>。当养老金制度改革较为频繁、保障信息不透明,或者政策调整缺乏连续性时,制度信号的强度就会下降,个体对未来保障的信心也会随之减弱<sup>[9]</sup>。制度信号的不稳定会迫使个体通过增加储蓄来进行风险的自我对冲。所以,制度信号强弱会直接影响储蓄焦虑的程度。

第三,家庭责任压力处,家庭结构变化是影响老年人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sup>[10]</sup>。随着家庭规模缩小,子女的流动性增强,传统的代际支持模式发生了转型<sup>[11]</sup>。一方面,老年人对未来子女照护能力的预期呈现下降态势,另一方面,部分老年人依旧承担着对子女与孙辈的经济支持责任。家庭责任的双向压力使老年人在风险判断时更趋向保守,储蓄焦虑由此得到强化。

第四,在社会信任基础方面,社会信任属于实现社会高效动员的关键条件<sup>[12]</sup>。在金融风险案件频繁发生、养老诈骗问题愈发严重以及信息差距持续扩大的背景之下,老年人对于市场和社会的信任感显著降低,当信任根基不够牢固的时候,人们更倾向于仅依靠自身存款来保障安全,从而形成保守型储蓄模式。

### 3 老年人储蓄焦虑成因的具体分析

综合前文所提出的四维结构来看,老年人储蓄焦虑的生成能够理解成风险扩散、制度信号波动、家庭支持转型与社会信任弱化这几个因素叠加作用后产生的结果。

#### 3.1 风险不确定性的持续扩散以及感知放大

在老龄化社会当中,风险不再是单一的事件,而是多重不确定性相互叠加的情况。医疗费用不断上升、慢性病长期管理需求持续增加以及寿命延长所带来的支出周期延展等情况,让老年阶段的经济风险具备长期性与不可预测性的特征。这种风险结构的变化改变了个体对于未来的时间认知。和传统风险进行对比,长期护理风险和高额医疗支出风险有着“低概率,高损失”的特点,很容易引发个体过度担忧。

更为重要的是,风险并非仅仅由客观数据来决定,而是在信息传播与社会讨论的过程中被不断强化。媒体

报道、身边案例以及公共舆论都有可能放大个体对于风险的主观感知。当风险感知持续高于客观风险水平的时候,个体就会通过提高储蓄来进行心理补偿。此时,储蓄行为已经不再是理性的资产配置,而是成为对抗焦虑情绪的工具。

#### 3.2 制度保障预期波动与信号不稳定

制度信号的稳定性是个体风险预期重要参照,当社会保障制度有高度可预期性和连续性时,个体能形成稳定的未来规划,然而在制度调整频繁、政策信息复杂或社会保障体系分层差异明显情形下,制度信号可能出现波动,制度信号不稳定会削弱个体对公共保障的信任,进而强化自我保险倾向,尤其是在养老金替代率预期下降、医疗保障覆盖差异明显情境下,老年群体常通过增加储蓄弥补制度信号不确定性,制度信号弱化不意味着保障水平实际下降,但预期波动本身可引发焦虑反应。

#### 3.3 家庭支持结构转型与代际责任再分配

家庭一直是老年风险分担重要机制,然而随着家庭结构小型化和人口流动性增强,传统代际支持模式发生转型,一方面子女外出就业导致照料能力下降,老年人对未来获家庭支持预期降低,另一方面部分老年人仍需承担子女购房、教育或创业经济支持责任,形成向下转移资源压力,这种双重结构性变化使家庭不再是稳定风险分担单位,而成风险重新分配场域,当老年人既担忧自身养老风险又承担子女经济支持义务时,储蓄行为呈现明显防御性特征,家庭支持结构弱化不仅增加客观压力,还在心理层面强化孤立感与不安全感。

#### 3.4 社会信任不足和安全感匮乏情况

要是公众对金融机构、社会组织还有公共政策持怀疑态度,那他们的风险评估一般都会趋于谨慎。近些年频繁发生的金融风险事件和养老骗局,进一步加深了老年人对于市场的不确定感觉,这让他们更倾向于保留现金或者选择低风险投资。社会信任的缺失不但制约了资产配置方面的决策,还加剧了人们内心的心理焦虑情绪。

### 4 社会动员视角下的治理路径

首先要以制度信号稳定化为基础,通过提升养老保障政策连续性和透明度,去强化长期护理保障体系建设,还要完善政策解释和信息公开机制,以此增强老年群体对未来保障水平可预期性,从源头上降低风险感知过度放大可能性;其次要以社区为中介来重建社会支持网络,推动社区养老服务、健康管理与互助组织发展,让老年人重新嵌入日常支持结构中,减少孤立化与风险内化等不良倾向,进而分担家庭支持转型带来的结构压力;再

次要完善情绪治理和风险沟通相关机制,通过开展系统化金融教育、澄清风险信息 and 建设防诈骗制度,提升老年群体对金融市场与公共政策理解能力,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引发恐慌性储蓄行为;同时要规范金融服务并强化市场监管工作,从而修复社会信任基础,降低安全感内收现象出现几率;最后要推动国家、社区、家庭与市场之间形成协同动员格局,让公共制度保障、家庭责任分担与社会组织支持相互衔接,构建起多元的风险分担体系。

在这样结构里储蓄不再承担所有安全功能,而是回归其合理规划角色定位。通过提升社会动员能力和优化风险分担结构,老年人群体储蓄焦虑才能实现结构性缓解,并且为老龄化社会稳定运行提供制度基础和社会支撑。

## 5 结论

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以及社会风险结构持续演变的大背景下,老年人储蓄行为出现从理性规划朝着焦虑防御转变的趋势。本文站在社会动员视角,突破传统经济理性分析的框架,把老年人储蓄焦虑放在多层次社会结构当中进行解释。当社会动员体系运行失衡且风险分担机制弱化的时候,个体就会通过增加储蓄来承担原本应由社会结构分担的风险,从而形成持续性的焦虑循环。

从理论层面来讲,本文把社会动员理论引入老年储蓄问题的研究之中,揭示储蓄行为的社会嵌入性以及制度依赖性,拓展了储蓄焦虑的解释维度。储蓄不只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社会结构状态的反映,是个体在社会支持不足的情境下进行风险自我管理的替代性选择。这一视角有助于深入理解老龄化社会风险应对机制,也为解释当前老年群体消费谨慎和资产保守现象提供新的理论框架。

从实践层面来看,缓解老年人储蓄焦虑问题的关键在于提升社会动员能力,重构多层次风险分担结构。只有通过稳定制度预期、强化社区嵌入、优化家庭责任分配以及修复社会信任基础,才能将风险从个体内部重新转移到社会结构之中,让储蓄回归合理规划功能。在此过程中,政策制定者要关注制度信号传导的稳定性与连续性,避免预期波动对个体行为产生过度扰动,同时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构建更加稳固的社会支持网络。

## 参考文献

[1] 杨志媛,盖晓敏. 老龄化、养老保险与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J]. 经济经纬, 2020, 37(04): 150-158.

[2] 袁益, 万仞雪. 社会焦虑心理与农村家庭储蓄决策——基于互联网的间接证据[J]. 南方经济, 2023, (09): 107-122.

[3] Buurma H. Public Policy Marketing: Marketing Exchange in the Public Sector.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1 (35): 1287-1302.

[4] 杜诗雨, 孙超群. 塑造行动漩涡: 一种基层社会动员的新形态——基于S市L社区“蔷薇巷”的案例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 2024, 21(03): 152-161+175-176.

[5] 蔡桂全, 张季风. 中国老年人家庭储蓄成因的实证研究——基于遗产动机的视角[J]. 人口学刊, 2020, 42(04): 70-81.

[6] 陈鲁雁, 吴童. 柔性政策动员: 乡村治理中农户参与的实现机制——以独龙江乡苹果产业为例[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3)

[7] 曹聪灵, 肖国安, 徐邵蕊, 等.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财政可持续视角[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22, 43(01): 114-122.

[8] 王诗宗, 杨帆. 基层政策执行中的调适性社会动员: 行政控制与多元参与[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11)

[9] 徐文娟. 新阶段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制的思考与研究[J]. 财经界, 2023, (09): 135-137.

[10] 余敏江, 方熠威. 情感动员与韧性提升: 不确定性风险下城市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基于上海市L社区的考察与分析[J]. 探索, 2023(4).

[11] 谢冰清. “久病床前无孝子”? ——家庭养老照护者的权益困境与出路[J]. 求索, 2025, (05): 91-100.

[12] 陈鲁雁, 吴童. 柔性政策动员: 乡村治理中农户参与的实现机制——以独龙江乡苹果产业为例[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3).

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 华心慧(2004.10-), 女, 汉族, 江苏无锡, 本科, 财务管理专业, 江苏理工学院; 通讯作者: 陆冠呈(1994.11.21-), 男, 汉族, 江苏常州, 博士研究生, 讲师, 江苏理工学院, 主要研究方向: 企业财务、公司治理;

第三作者: 赵艺萌(2005.07-), 女, 汉族, 江苏句容, 本科, 财务管理专业, 江苏理工学院;

第四作者: 张宏宇(2005.07-), 男, 汉族, 江苏苏州, 本科, 财务管理专业, 江苏理工学院;

2025年江苏理工学院创新训练项目: “低利率环境下储户存款焦虑银行纾解路径调查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课题编号: KYX25004.